

從歷史看現實： 對美蘇冷戰起源的再思考

沈志華

自中美貿易摩擦以來，短短兩三年，兩國關係一落千丈，跌至1972年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的最低谷，目前已處於極度緊張狀態。如何理解這突如其來、翻雲覆雨的國際變局？中美關係因何急劇惡化？「冷戰」是否會重新出現？歷史是一面鏡子，了解冷戰的歷史，尤其是美蘇冷戰起源的歷史，對於人們觀察現實無疑是有所裨益的。不過在我看來，歷史學家只是做鏡子的，不是照鏡子的，歷史學家的責任主要是還原歷史真相，把過去發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弄清楚。而照鏡子的是現實決策的領導者和參與者，以及研究現實問題的學者和智囊。歷史研究不能替代現實決策，但了解歷史可以為決策者提供一個觀察現實問題的視角和借鑒。

一 新冷戰？

首先要說明一點，我不贊同中美在重演美蘇冷戰意義上的所謂「新冷戰」的說法。當前的中美關係與戰後的美蘇關係雖說有很多相似之處，但區別也是很明顯的，主要有兩點：

第一，冷戰形成中的美蘇是完全異質的兩個國家，共產主義要消滅資本主義，資本主義要消滅共產主義，它們之間是一種「你死我活，有你無我」的關係。而現在中美之間在這方面的界限模糊了很多，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經濟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早已擺脫了蘇聯模式，儘管還不能稱之為完全的市場經濟，但確實正在走向市場經濟，開始融為世界經濟體系的一部分。從經濟層面講，如今中美之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這與當年美蘇關係是有重要區別的，會表現出不同的過程、狀態甚至結果。

第二，冷戰的最大特徵之一是美蘇之間的對抗改變了世界格局——從戰前的均勢格局改變為戰後的兩極格局。美蘇對抗不僅是兩國關係、更主要的

是兩個陣營（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或政治軍事集團的對抗。如今社會主義陣營已不復存在，而美國雖仍有很多盟國，但是這些盟國與美國在對華政策上並不一致，更沒有形成針對中國的戰略同盟。也就是說，現在的中美衝突還只是兩國之間的事情，這對未來的世界格局會有怎麼樣的影響尚待觀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形成新的兩極格局可能性不大。

所以，用簡單套用歷史概念的「新冷戰」來表述當今中美關係是不合適的。照我的理解，其實人們關注的主要是中美關係為何會陷入低谷和對抗、是否會重蹈歷史覆轍，以及未來的走向又將如何。因此，如果要借鑒歷史的經驗，這裏要討論的重點在於為甚麼戰後美蘇會從合作走向冷戰、斯大林是如何掉進「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的、歷史的拐點到底在哪裏，以及這段歷史對當下中國處理與美國的關係有甚麼借鑒意義。

二 美蘇冷戰的起源

關於冷戰的起源問題，學術界一直爭論不休，出現了各種派別。我個人認為，冷戰的強勢和主動一方是美國，冷戰格局形成的主要驅動力也在美國。道理很簡單，當時美蘇實力相差太大：從軍事上講，美國有原子彈，蘇聯沒有；美國有航空母艦，蘇聯沒有；美國有戰略空軍，蘇聯也沒有。從經濟上講，全世界黃金儲備的百分之七十都在美國，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是蘇聯的四倍到五倍。所以蘇聯要挑戰美國，首先在邏輯上就說不通。事實也是如此：戰後初期蘇聯的思維和行為儘管舛誤不斷，但沒有一點是直接傷害美國利益、挑戰美國權威的。美蘇隔洋相望，本來沒有地緣政治的交集，後來發生衝突，是因為美元和美軍到了歐洲，而不是相反。

那麼，戰後美國為甚麼非要認定蘇聯是敵人呢？很多學者認為，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法西斯滅亡，美蘇共同的敵人不存在了，所以同盟必然分裂。這個說法也不合邏輯。共同敵人是否存在，並不決定一個國際同盟的存亡。比如，冷戰結束了，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都不存在了，以美國為首的同盟組織不僅沒有分裂，反而加強了。實際上，戰後美國對蘇遏制戰略的產生，關鍵在於美國國內政治和對蘇認知發生了改變。

戰爭期間，美蘇之間緊密合作，這表現在軍事（歐洲第二戰場開闢和蘇聯對日作戰）、外交（三次首腦會議和多次外長會議）、經濟（美國對蘇聯的「無條件」租借援助）各個方面。關於戰後的世界秩序安排，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和斯大林也達成了共識，即從「四大警察」到五個常任理事國，通過聯合國機制實行「大國一致」的原則，其中最重要的是實現美蘇共治。為此，美國在地緣政治上滿足了蘇聯的安全要求——波羅的海出海口、波蘭、德國、巴爾幹以及太平洋出海口等，在經濟上滿足了蘇聯加入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 的各項要求——大幅提高蘇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中的份額、同意莫斯科作為黃金儲存地、給予貿易壟斷和盧布匯率調整數年緩衝期等，而蘇聯則採取了一系列放棄世界革命方針的措施，如下令解散共產國際、西歐主要共產黨交出武裝力量，以及在其控制的範圍內推行多黨選舉制等。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戰後美蘇和平共處、全面合作的局面是可以繼續維持的，雅爾塔體系的目標也是可以實現的。

然而，羅斯福總統去世以後，美國的國內政治發生了重大改變。民主黨長期執政早已引起共和黨的忌恨，羅斯福政府的親蘇政策在國會兩院也一直有人質疑，隨着戰爭進入尾聲，美國右翼政治勢力和反蘇反共傾向日益抬頭。杜魯門 (Harry S. Truman) 屬民主黨右翼，入主白宮後大量更換主要政府官員，逐漸改變羅斯福的政策，並且由於意識形態的偏見，往往過度甚至錯誤地理解和認知蘇聯的戰略意圖。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憑藉其絕對的軍事和經濟優勢，形成了一種「優勢戰略」或「霸權戰略」，其總體目標就是要永久保持美國在全世界的優勢地位和霸權地位，如果有誰挑戰或有可能挑戰這種地位，美國必須做出強硬的反應。於是，作為戰後第二強國（主要在政治和軍事意義上）的蘇聯，自然就成為美國防範、遏制和攻擊的對象。

不過，從歷史發展的結果來看，在美蘇關係急劇惡化和冷戰起源的進程中，蘇聯也不是完全被動、無辜的一方。面對美國的輿論挑釁和政策壓力，蘇聯的對外言論和外交行為不僅沒有化解雙方的分歧和矛盾，反而刺激美國進一步採取強硬立場；不僅沒有消除來自美國右翼政治的壓力，反而促使美國國內各種力量凝聚起來，形成愈來愈強大的反蘇勢力，甚至不斷把西歐和蘇聯周邊國家推向美國的懷抱。弄清楚究竟蘇聯的決策有哪些失誤和值得記取的教訓，對於今天的中國或許可以作為一面歷史的鏡子。

從戰爭結束到 1946 年初，美蘇之間的分歧不斷增加和擴大，美國對蘇聯的不滿和指責主要表現在戰後賠償、波蘭臨時政府的建立，以及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東歐國家的選舉等問題上，尤其引起美國疑慮的是蘇聯在有效期限內拒絕宣布加入 IMF 和世界銀行 (World Bank)。對於蘇聯的做法和政策，美國採取了強硬措施 (如突然停止租借、拖延貸款談判等)。不過，白宮和國會內部還是有不同看法的，有人認為這表明蘇聯要實行「單邊主義」，不再與西方合作，也有人認為這是蘇聯勢力範圍之內的事情，美國不必干預。杜魯門決定採取繼續觀望的態度，還為蘇聯加入布雷頓森林體系提供了三個月寬限期。

但就在這樣一個微妙的時間段，《真理報》(Pravda) 發表了斯大林 1946 年 2 月 9 日的選舉演說。講話內容主要是強調：二戰的結局證明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最優越的，否則就不可能戰勝法西斯；現在仍然存在戰爭的危險，因為按照列寧的理論，帝國主義就是戰爭，所以蘇聯必須堅持自己的制度，並做好戰爭準備。斯大林這些話本來是針對蘇聯國內講的：戰爭期間蘇聯軍隊和社會與西方世界接觸以後，對過去政府宣傳產生了懷疑，人心思變。斯大林擔心蘇聯民眾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失去信心，遂大力加強輿論和社會控制，日丹諾夫主義 (Zhdanovism) 由此而生，即所謂「擰緊螺絲」。然而，結合蘇聯國內的政治動向，美國人把斯大林的這個講話理解為同西方對抗的政治宣言。

2月22日，美國駐蘇聯代辦凱南(George F. Kennan)應國務院的要求，從莫斯科發回了著名的「長電報」(“Long Telegram”)，分析「蘇聯行為的根源」。凱南從俄國歷史和意識形態兩個方面進行論證，認為蘇聯就是一個擴張型國家，戰後蘇聯有了穩固的地緣政治基礎，就更要實行擴張了。為此，美國應該堅決進行遏制。這個判斷當然是錯誤的：雅爾塔體系是蘇聯安全的保障，斯大林怎會主動破壞它？蘇聯對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確持懷疑態度，但當時也並非完全拒絕，而是期待更有利的條件。然而，凱南的電報迎合了美國的政治氣氛，在政界引起熱烈反響，白宮和國會爭相傳閱，美國對蘇的「遏制」戰略開始醞釀。

與此同時，蘇聯的外交舉措似乎恰恰為凱南的判斷提供了證據，這就體現於同年爆發的伊朗危機和土耳其危機。其實，蘇聯在這兩個國家的外交目標都是有限的，對伊朗只是要求北部石油的特許專賣權，對土耳其則是要保障黑海出海口的安全；但蘇聯的外交行為卻過份誇張，在伊朗以停止撤軍作為威脅，並策動庫爾德民主黨推行自治，在土耳其則提出要於海峽地區建立軍事基地，並以領土問題進行威逼。儘管面對美國的干預，蘇聯最終都採取了退避三舍的立場，但由此給蘇聯國家形象造成的極大損害已無法挽回，並使得美國和國際輿論進一步認定蘇聯就是一個擴張型國家。

伊朗危機和土耳其危機導致美國的對蘇政策更加強硬，到1946年中，原來答應向蘇聯提供的戰後重建貸款完全取消了，原來同意蘇聯在德國西佔區取得的戰爭賠償也宣布停止了，這無疑是切斷了蘇聯期盼已久的幫助經濟恢復的外部資源。為此，蘇聯也徹底斷絕了加入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念頭，邁出了與世界經濟體系割裂的第一步。不過，儘管此時美蘇關係進一步惡化，但仍然沒有發生直接的政治碰撞，因為兩國沒有地緣政治的交集。美國戰後本不願捲入歐洲內部的事務，更不想為歐洲承擔責任。把美國「邀請」到歐洲的主要是英國。1946年3月5日，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密蘇里州富爾頓(Fulton)發表的「鐵幕演說」(“Iron Curtain” Speech)，就是鼓吹英美「同文同種」，美國與英國聯手治理歐洲，但鼓動效果不佳。真正的轉變是在希臘危機中實現的。

1946年爆發的希臘內戰並非克里姆林宮所策劃，斯大林甚至不同意希臘共產黨進行武裝暴動——在1944年10月英蘇達成的「百分比協定」中，斯大林認可希臘是英國的勢力範圍，對此美國人也是清楚的。但是，戰後英國經濟急劇衰落，負債纍纍，實在無力經營巴爾幹，甚至向駐希臘英軍提供軍費都感到囊中羞澀。在這種情況下，英國只能向美國求援，其邏輯是一旦共產黨控制希臘，就會產生連鎖反應，整個巴爾幹乃至西歐都將淪入莫斯科的魔爪。這個描述完全符合美國右翼勢力的心態和立場，1947年3月，「杜魯門宣言」(Truman Doctrine)應運而生——美國決心介入歐洲事務了。

就在美國國會討論總統對於援助希臘的提案時，關於解決戰後德國問題的莫斯科外長會議於4月破裂了。美蘇圍繞德國問題的爭論，無論是賠償問題、魯爾(Ruhr)問題還是統一問題，其核心首先都是經濟問題。蘇聯的目標是盡可能多地向德國索取戰爭賠償，以滿足蘇聯戰後重建的資金需要；美國的目標

是盡量維持德國戰後經濟自立和自救的狀況，以避免美國為德國的戰後生存買單。杜魯門宣言沒有引起蘇聯的重視，認為不過是宣傳而已，斯大林也沒有意識到外長會議破裂的嚴重後果——美蘇在德國乃至歐洲問題上已經沒有共同語言，他還期待着下一輪談判。而此時，美國國務卿馬歇爾 (George Marshall) 的歐洲之行讓他深刻感受到歐洲經濟恢復所面臨的嚴峻局面和後果。於是，美國在6月提出了援助歐洲的經濟計劃——「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

在美國人的心裏，援助歐洲當然包括德國(西佔區)，而絕不可能有蘇聯的份，但這種話又無法說出口，因為美國不能承擔分裂歐洲的責任——美國決策者對佔領道德制高點非常在意。蘇聯從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出發，以為馬歇爾計劃是美國陷入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結果，是為美國資本家的過剩資本尋找出路，直到7月在巴黎會議上與英法代表爭執時才發現美國的真实意圖。蘇聯既不能容忍將德國納入援助計劃，也無法接受「一攬子」安排的援助方式——其背後是蘇聯一貫反對的歐洲經濟一體化願景。「克格勃」(KGB，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供的關於英法代表私下商議如何將蘇聯排除出計劃的情報，更讓斯大林怒不可遏。結果，莫斯科不僅宣布不參加馬歇爾計劃，而且蠻橫地禁止所有東歐國家參加。蘇聯由此關閉了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大門，從而犯了一個戰略性的錯誤——這種主動與西方經濟進行切割的做法，正中美國人的下懷。

杜魯門宣言和馬歇爾計劃表明美國已經確定了與蘇聯進行對抗的「冷戰」戰略，蘇聯本應避其鋒芒，虛與委蛇，不輕言退出，特別是讓東歐國家繼續進行談判，事情可能還有轉機，至少在國際輿論方面取得同情。但此時讓斯大林感到不安的是，歐洲主要國家的共產黨愈來愈傾向獨立(法國和意大利共產黨被迫退出政府、波蘭和捷克共產黨傾向接受馬歇爾計劃)，很可能擺脫莫斯科的控制。於是，在拒絕馬歇爾計劃之後，9月，蘇聯召集了歐洲共產黨、工人黨情報局會議，實際上就是重建共產國際，並宣布世界已經分裂為兩大陣營——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世界革命的旗號再次飄揚在歐洲上空，蘇聯終於也走上了冷戰的道路。由此，歐洲冷戰和世界兩極格局開始形成。

共產黨情報局宣布成立以後，在歐洲引起一片恐慌，歐洲各國想聯合起來抵制蘇聯。但是它們之間(如法國與英國、北歐與南歐)存在種種分歧和矛盾，經濟援助計劃還在「扯皮」，政治聯合更加不易。對此起了推動作用的恰恰是蘇聯自己。斯大林的冷戰方針其實是「外線防禦、內線進攻」，主要是穩住自己的陣腳，整頓內部——1948年開始的蘇南衝突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歐洲共產黨、工人黨情報局會議禁止希臘和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參加，日丹諾夫 (Andrei Zhdanov) 的報告也無視希臘內戰和中國革命(即國共內戰)。但是，東歐國家要游離於蘇聯集團之外是絕對不允許的。在莫斯科的策劃下，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發生政變，原本作為「東西方橋樑」的總統貝奈斯 (Edvard Beneš) 被迫下台。整個歐洲為之震驚，一個月後，針對蘇聯的布魯塞爾條約組織 (Brussels Treaty Organisation) 便成立了。

不過，事情還沒有發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冷戰初期，僅僅是美元進入了歐洲，美國的政治勢力和軍事力量都還沒有與蘇聯正面交鋒。美國對歐洲首先是進行經濟干預——這對美國而言也是有利可圖的。當時美國國會多數議員認為，歐洲穩定和發展還是它們自己的事情，美國不能包辦，更不能負責。布魯塞爾條約組織不包括美國，也沒有德國。歐洲人大都渴望由美國人來領導歐洲的防禦，但對於是否接受德國人參加，有很大分歧。這時，德國爆發了柏林危機，實現西歐政治一體化的障礙也消除了。

柏林市地處東德，也是由美、蘇、英、法四國分區佔領，美國一直主張德國的經濟恢復必須統一管理，包括柏林在內，但就是與蘇聯談不攏。1948年4至6月，美、英、法在德國的佔領區連成一體，單獨實行貨幣改革，以消除通脹，穩定經濟。蘇聯阻止不成，決定實行封鎖，對柏林西佔區斷水、斷電、斷糧，試圖把西方勢力趕出東德，拔掉這個眼中釘、肉中刺。美國不僅沒有退讓，反而實行了「反封鎖」，不僅建立起「空中走廊」，向西柏林運輸各種物資，而且將可以裝載原子彈的戰略轟炸機部署到英國。在長達半年之久的軍事和經濟實力對抗中，蘇聯的目標最終落空，只好無條件解除封鎖。柏林危機爆發後不久，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北約)迅速建立起來，德國被分裂為兩個國家——西德重建武裝力量的政治障礙已經排除，美國的政治和軍事勢力也進入了歐洲。面對美蘇在歐洲全面對抗的緊張局勢，莫斯科不得不採取「和平攻勢」。

北約成立以後，美國急需大幅擴充軍備，但在國會受到很大制約。1949年8月蘇聯核爆炸成功和1950年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締結極大刺激了美國的神經，同年4月形成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NSC 68)提出了全面遏制蘇聯的新的戰略方針，其中主要的實質性內容就是大幅增加軍費開支。但該文件在美國要成為立法文件(國策)，還需要經歷朝野兩黨協商、國會兩院通過的複雜(可能還是漫長)的過程。結果，朝鮮戰爭的爆發大大加速了這一進程。

其實，斯大林同意金日成發動戰爭，並不是要挑戰美國，更不是像一些學者認定的那樣，要在亞洲進攻美國——蘇聯得到的情報是美國不會干預這場軍事衝突。朝鮮戰爭真正的起因在於，毛澤東在《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談判中堅持要收回旅順、大連地區和中國長春鐵路的主權，蘇聯因此將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而這是戰後蘇聯在遠東地區戰略利益的保障和支撐點。斯大林只是想通過在東亞地區製造緊張局勢，保持蘇聯在遼東半島或朝鮮半島的海軍基地。但是在美國人看來，蘇聯擁有了核武器，又與中國這個亞洲最大的共產黨國家結成盟友，現在朝鮮半島發生戰爭，這是社會主義陣營要全面開戰了，所以必須做出激烈而強硬的反應。美國在1950年6月宣布出兵朝鮮半島，派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同時在印度支那採取「積極行動」，並很快在歐洲實現了北約軍事化，其整體軍備大幅提升。同時，美國建立起一系列針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區域同盟，對中蘇形成半月形包圍圈。國際局勢驟然全面緊張，冷戰格局在世界範圍內形成。從此，美蘇冷戰對峙的局面不可挽回。

三 冷戰的歷史教訓

通過上述對冷戰起源歷史過程的簡要回顧，我們可以看出：蘇聯本不想與美國對抗，但恰恰是斯大林的選舉演說及其國內政策促成了白宮「遏制」戰略的提出；蘇聯不希望美國的勢力出現在蘇聯周邊，但恰恰是伊朗、土耳其和希臘危機讓美國重返歐洲和中東；蘇聯擔心西歐實現一體化，但恰恰是捷克斯洛伐克政變導致布魯塞爾條約組織的成立；蘇聯害怕美國與西歐聯手合作，但恰恰是封鎖柏林的行動推動了美國領導的歐洲一體化及軍事同盟的出現；蘇聯最擔心與美國形成全面的軍事對抗，但恰恰是朝鮮戰爭的爆發加快了美國與其盟國全面擴軍備戰的進程……戰後莫斯科走出的每一步幾乎都是事與願違，其行動結果完全背離了自己的外交和政治目標。

在應對美國的壓力和遏制時，蘇聯錯招頻頻，舛誤不斷，一步一步陷入了冷戰的泥沼而無法自拔。簡單概括一下，我以為至少有以下幾個值得記取的歷史教訓：

第一，蘇聯對美國的多元政治和決策機制缺乏深入的了解和理解。在美國，社會輿論、外交決策和國會立法之間，以及兩黨和兩院之間，相互制約，關係微妙。斯大林過於相信和看重羅斯福的作用，忽視了美國輿論對大選和立法的影響，也對美國政治的變化缺乏準確的判斷，應對起來不免盲人摸象、南轅北轍。

第二，蘇聯在涉外問題的宣傳方面僵硬死板，習慣於將國內政治的邏輯套用於對外宣傳。其中最大缺陷就是體制上的「一言堂」，無論是好是壞、是左是右，從來就只有一個聲調，結果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往往進退失據，作繭自縛。

第三，蘇聯外交的決策機制和程序也存在很大問題。對比美蘇兩國重大外交決策的檔案可以發現，美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發揮了重要作用，各個有關部門反覆磋商修改，最後形成一致意見，交由總統下發指令。蘇聯的決策大都是委託某個主管部門起草決議，將決議附在報告後呈送最高領導，基本上都是一次通過。這就難免有「揣摩聖意」之嫌，且結果就是國家利益部門化。

第四，最重要的是，蘇聯領導人對戰後國家發展戰略缺乏正確的認知和設計。斯大林過於重視安全戰略，卻忽視了經濟發展戰略，再加上受傳統意識形態影響而導致的認識誤區，沒有看清戰後世界經濟走向全球化的歷史趨勢，更沒有抓住戰後對蘇聯經濟體制進行改革的國內和國際有利條件，錯失了蘇聯進入世界經濟體系的歷史機遇。

追根溯源，就冷戰的結局而言，蘇聯的失敗，與其說是敗給了美國，不如說是敗給了自己。